

電影批評與創作問題

黃鋼 著

電影批評與創作問題

黃 鋼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電影批評與創作問題

著者	黃	鋼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三廠	
	(上海霍遜路一一七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

書號(323) [I 1 31] 類別 文藝一般
字數 90000字 開本 787×1092 1/28 印張 5 3/7
1954年 11月上海第 1版——第 1次印刷 1—4100冊
定價 8.000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內容，涉及電影評論工作的很多重要的原則，闡明着電影劇本創作中的某些根本的規律。全書包括了作者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在電影工作崗位上一部分主要的論文。大體上分下列兩方面輯成：

(一)有關我國電影事業方向等問題的論爭與述評。

(二)直接論述我國電影劇本的創作工作與對新聞紀錄影片批評準則的文字。其中，並有『紀念普多夫金』及『向『偉大的公民』學習』兩篇文章，都是通過了蘇聯電影藝術工作中的某些範例。

努力注視着電影工作中當時思想發展的動態，堅持地衛護着爲工農兵服務的電影事業方向，形成了以上兩部分文字的中心主旨與首要的特徵。

目次

從『武訓傳』討論中看電影批評工作問題	一
上海紗廠女工會是怎樣看待和批評電影的？	二
錯誤的例證和混亂的論點	三
葛雷菲斯是『電影之父』嗎？	四
對在電影工作中貫徹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藝方向必須有正確的理解	五
電影局開展整風學習的兩個關鍵問題	六
電影工作者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週年	七
* 中國電影爲世界和平而鬥爭	
影片『鋼鐵戰士』和它獲獎的意義	八
論目前電影劇本創作中的主要問題	九

向『偉大的公民』學習.....	九四
紀念普多夫金.....	一三
我國紀錄電影的新成就.....	一三
英雄的業績和英雄的頌歌.....	一〇
紀錄片『成渝鐵路』的文獻價值和主要缺點.....	一四
重編後記.....	一四三

從『武訓傳』討論中看電影批評工作問題

——加強電影批評的嚴肅性、戰鬥性和羣衆性

『人民日報』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在我國的文化、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把電影批評工作放到了極其鄭重嚴肅的地位。由這社論和『人民日報』的『黨的生活』欄所領導與發動的這一次重大的思想論爭，得到了廣泛的影響和深刻的巨大的效果。這效果在『武訓歷史調查記』、周揚同志的『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和夏衍同志的『從「武訓傳」的批判檢討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等文相繼發表之後，思想上的收穫將更鞏固了。參加和學習了『武訓傳』討論的人們，都通過這一有根本性質的原則論爭，明確懂得了革命者與封建統治者的區別，人民民主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區別，民族傳統中落後的、消極的、反動的東西和進步的、積極的、革命的東西的區別。同時也明白了部分文化工作者，在那裏曾是傳播着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而另部分文化工作者，當時又沒有力量的區別這種思想，甚至有些共產黨員的文化工作者，在此問題上也離開了無產階級立場，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缺乏對於歷史唯物論和階級鬥爭的基本觀點的

認識，使「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文化界的思想在這個問題上曾表現了異常的混亂。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京、津、滬三地的電影批評工作，在「武訓傳」電影放映期間，集中表現出來的錯誤和軟弱，當「武訓傳」電影所代表的反動思想，向新中國人民進行挑戰的時候，部分的影評者沒有盡到在思想上衛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職責，反而是首當其衝地被敵對思想所俘擄。因此，這一情況，除了是因上述根本的原因外，同時是與電影批評戰線——文藝批評的重要環節——上政治思想水平的低下，其本身又沒有十分明確、堅強和十分具體的戰鬥綱領、缺少健全的工作作風等等，有着密切的關係。

電影批評應把祖國的利益和教育人民的職責放在首位，應具備明確的階級觀點、充分的生活知識，用以判斷作品的真正思想

電影批評的出發點是什麼？

電影批評，應當是電影觀衆的教師或指導者。一篇正確的電影批評，就是在千萬的觀衆面前，幫助他們去選擇和認識他們心愛的有益的電影作品。因此電影批評是受廣大觀衆委託的、責任重大的工作，它首要的責任是要善於準確辨別影片的思想內容，用敏銳的無產階級觀點去進行作品的思想分析。當進行這種思想分析時，影評者必須掌握新現實主義的批評方法，憑藉着可信的、真實的知識，去判斷作品同生活的關係，考察作品是否反映了歷史的眞

實、是否在現實的革命發展中來反映生活，測量作家是否真正把教育人民的任務放在首位。影評者應通過電影評介，來宣揚和支持生活中一切新生的、先進的、正確光輝的事物，同時要清醒地警惕和指出影片中一切對人民有害的思想因素；需要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積極宣揚，給一切進步的或衷心願意進步的作家以系統的影響。影評者應該充分地體察人民今天的需要，靈敏地表達出祖國對於文學藝術工作的高度要求。這樣的影評，就可能成爲進行人民民主革命教育與宣傳共產主義真理的最好工具之一。影評工作者爲人民服務時，又都必須首先運用調查研究的武器。

但是，最初對電影『武訓傳』進行歌頌的人們，幾乎全部違背了這個要求。如他們後來說道：

當我寫那『由教育觀點評『武訓傳』』時，手頭唯一的材料就是這本『畫傳稿』。我自以爲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寫的，卻不料是站在西太后以至於蔣介石的立場，向廣大人民作了散佈毒素的工作！（董渭川：『武訓問題給我的教訓』，『光明日報』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二日）

首先我必須承認，對武訓這個歷史人物，並沒有調查研究，也沒有掌握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來對他進行科學的分析與批判，而只是人云亦云地對他盲目表揚，這樣的態度，也是非常錯誤而不敢肅的。（金紫光：『從新認識武訓』，『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北京『工人日報』編者『初步檢討』說他們接到歌頌『武訓傳』電影的荒謬稿件時，

「編者以爲電影既然在北京上演，大致差不到哪裏去。對於武訓生平爲人，鬧不清楚，不加調查研究，也不去看一看這電影，就草率的登出來。事後也沒有及時加以檢討。這不僅說明我們思想上的麻痺，也表現了我們的工作態度不夠嚴肅負責。」

的確，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伴隨物——這種反科學、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方法，真是害了我們不少的電影評論者！上述的事實說明：若干評論者看影片時不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理解問題，同時也說明：我們多少作者，在撰寫評論之前，還沒有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進行周密調查——詳細佔有材料——加以分析研究——然後才得出正確結論的科學的習慣。許多『武訓傳』影片的批評者忘記了這一條淺近的規則，這就是批評家必須熟悉生活、必須具備有站立在時代頂端之上的知識水準；他們忘記了『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真理，忘記了偉大的、革命的民主主義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在履行愛國主義的批評活動時切實依賴的基礎，這就是高尚的思想又結合着真正的知識，他們對於俄國歷史及其現實問題的了解，不僅沒有落後於作家，而且，在對生活及其發展前途底理解中，不低於他們。這便是作爲一個評論家必應具備的條件之一。

對於電影『武訓傳』的錯誤評論，表現了有很多評論者，在這一問題上，同樣是受了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影響，因此，很多批評者，就沒有可能從無產階級思想觀點和真實的歷史

知識出發。他們是從什麼地方出發呢？那就是『人云亦云』，缺乏獨立的思考，那就是『從形式上看問題』，以至錯誤地『借題發揮』；影評工作上思想領導的薄弱確是相當長時間存在的，這一點以那時的上海表現得最爲嚴重。夏衍同志在前述的他的檢討文中說：『兩年來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就做得非常不夠，我們對於堅持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認識是十分膚淺的。』這種情況是應該結束了。應該在批評工作上堅持思想鬥爭的原則性、嚴肅性。董渭川在他的『錯誤在於我的「教育」觀點』文中，除了說明一些思想上根本錯誤外，還說到：在他寫作錯誤的歌頌文字『由教育觀點評「武訓傳」』時，『我考慮着一開始就批評影片的糟糕，不太合宜，就先把武訓的教育價值大事頌揚……』（『光明日報』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看，假如我們在文化界再保存這種無原則的作風，結果就會把嚴肅的思想工作，變爲庸俗習氣的犧牲品！

『武訓傳』歌頌者錯誤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他們本身思想的錯誤，另一方面，也是對自己所要歌頌或批評的對象，沒有做起碼的調查研究。有些作者寫作評介時的潦草與不負責任，達到了異常驚人的程度，如介紹『武訓畫傳』的某作者反省說道：『……對這本畫傳並沒有好好去看，粗率地即寫了一個介紹，算交代了「任務」，盡了所謂「友情」的責任』（『光明日報』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日），他竟能委託別人替他看看畫傳，提提書面意見，自己就發表介紹！向『工人日報』投『武訓傳——電影故事』一稿的作者直認不諱道：

「自己也根本沒動腦子，毫無分析批判，也跟着說好，並隨手寫了介紹！」（『工人日報』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這些作者的自白，說明了他們毫不嚴肅慎重，一點也不會認識到批評工作對於人民的崇高教育職責。

應當把祖國的利益和教育人民的崇高職責放在首位，應具備明確的階級觀點，充分的生
活知識，用以判斷作品的真實思想，這才是進行電影批評工作時首要的出發點。

鑑賞作品最重要的標準是在內容的判斷，藝術評價服從於政治的標準，

批評家應幫助電影作家嚴格地審查其藝術創作的道路

那麼，藝術上的問題又怎麼樣呢？

關於批評的標準問題，以及關於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的關係問題，本來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解決了的。但一些評論者在錯誤歌頌『武訓傳』的過程中，確有不少人對『武訓傳』電影底『藝術』表現了迷惑，如從下列檢討中就可看到這一問題：

……我過多地評論了『武訓傳』電影和『武訓畫傳』的藝術，太輕太淡地（而且是不正確的）觸及了政治意義。這不免是西方資產階級『藝術至上』的形式主義美學的影響。因為缺乏對政治意義的足夠的重視，所以就藝術標準的批評，也就犯了錯誤。例如我指出武訓電影之『熱鬧和羅曼

締克底抒情並沒有提高它的藝術性，反之，是降低了它』，然而理由呢，是：「損害了武訓事業的嚴肅性」。其實，武訓事業根本沒有什麼正義的價值，也就說不上損害不損害它的嚴肅性了。可見不把政治性放在第一位，藝術性的批評是不會正確的。（見李長之：「我在關於『武訓傳』的討論中獲得了教訓」，『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這是一個頗恰當的例子。是的，對於一部作品的美學的分析，應該成爲電影批評的一個基本的成分；而且一般地說來，我們還反對那種對於作品的藝術價值不作估計的『批發式』的『影評』；反對影評文字膚淺地停止在那種因循式的『主題介紹』的公式之中；反對那種凡談到藝術問題時的一般性的空洞措詞；反對一談到藝術就言之無物的八股文章；反對用同樣的頌詞與簡單的條文，去扣在任何較好的電影藝術作品的頭上。影評界急切需要這樣的文字：它能對於影片的社會政治價值、作家思想特徵和藝術創造，以及重要技術成敗的各個方面，實行準確的觀察和評價。但遺憾的是，直到今天，這樣的影評還是很少；這不能不看成是電影批評中的重大弱點。但是，在這一切正常的要求之前，有一個重要的原則，這就是鑑賞作品的最重要標準還是要看它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的思想。如果脫離了對於電影『武訓傳』反動的主題思想的分析，而去孤立觀察它底藝術，就難於揭發它全部形象的虛偽、醜惡、荒謬絕倫，和那樣多的強烈的毒素。

『武訓傳』電影的錯誤歌頌者之中，原有不少側重於技術的熱心家。如像這一種『技

術性的評論，說『武訓傳』電影『對歷史人物的處理，還有些問題，但就製片的藝術和趙丹的表演上，卻是很高的水平的。』（見『進步日報』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魯荻文中的敘述）待『武訓傳』開始遭到嚴正批判，又一種熱心家又說：『雖然內容有錯誤，但藝術表現是好的。』（見『大眾日報』『我對『武訓傳』意見』文中所引材料）這些觀點，在藝術與思想的關係上表現出二元論的錯誤。我們如果首先夠地認識到電影『武訓傳』的思想本質，同時作深刻的、有聯繫的分析，則它的藝術性是不是『高』，也就不會下簡單肯定的結論了。

實際上，如不少讀者所指出的，電影『武訓傳』是用藝術的手段巧妙地宣傳了反動的思想，捏造歷史、掩蓋真象，在藝術上極盡粉飾和欺騙之能事；它完全離開了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它『從思想到手法飽含有美國電影很深的毒害』（引號內的意見，見『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讀者來信』欄有關該問題的來信）。根據可靠的材料，我們知道導演孫瑜先生和崑崙公司是準備到恰當時機，便剪掉影片頭尾空講『為人民服務』的部分，其他原封不動，就送到美國去發行上演的。由此可見，對人民觀眾和對電影編導等人同樣是負有教育責任的影評家，應該幫助某些電影作家嚴格審查他自己底創作道路，使他們能儘快地真實地走上用藝術作品為人民服務的正軌，這一任務應該說是很迫切的。

選擇劇本時就需要開展原則性批評，影片上演又必須傾聽和發揚

工農兵羣衆中的正確意見

當然，對『武訓傳』這樣宣傳反動思想的影片，即令它一上演就開始批評，站在電影領導工作的角度以及廣義的批評範圍來說，都有些晚了。重要的問題，是在於劇本拍攝前，就應該展開原則性的文藝批評。

電影上演節目的繁榮與否、正確與否，在最完全的意義上講，對劇本選擇與寫作問題的批評，是負有直接而重大的責任的。

『蘇維埃藝術報』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社評『戲劇寫作對劇場的義務』內說道：

經常討論戲劇寫作的問題，應當成爲一種慣例，而且不僅僅引起文學團體、戲劇團體的注意，也應當引起一般人士的注意。應當把這種討論發表在報章雜誌上。每一個新劇本在演出之前，必須經過盡可能廣大的聽衆的原則性的深刻分析。（着重點是我加的——引用者）這種事前的討論將使貧弱的、往往歪曲現實的、類似K·芬恩的『誠實』那種作品不致鑽上舞台。（本文載於「時代」雜誌第十一年第十四期）

這種事前的電影腳本討論，只有評論者完全依據了人民的利益，而且是十分清醒地堅持

思想原則的時候，才可能進行得好。

『武訓傳』電影腳本的事先討論，與這種精神是相違背的。

當時，根本原因是對『武訓傳』問題沒有明確的認識，缺少政治上的敏感，這是在與此次事先討論有關的同志們的文章中說到了的。但此外還有什麼東西障礙了我們同志自己底認識和黨性的純潔呢？陸萬美同志對此曾說：這是『對於藝術傾向上反現實主義的以至商業性庸俗的、不夠忠誠嚴肅的作風，也未進行認真的批評和幫助』的結果；陸萬美同志由此而歸結道：這是『思想鬥爭上右傾的表現，結果就造成了今天嚴重損害人民利益的錯誤。』

（『我對拍攝電影「武訓傳」底初步檢討』，重慶『新華日報』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九日）

事實說明，祇要在任何時候，我們的電影評論者一墮入了同情所謂『小市民觀眾口味』的泥坑，在藝術上失去了嚴肅批判的思想能力，那麼，就不會在影片上演前後深感到開展原則性批評的必要。這一經驗，將促使我們電影事業中的重要人員，劇影協會及文學團體的負責人等——他們是拍攝前脚本及電影上演前的主要批評者——得到教益，這就是必須把思想領導工作放在首位，把貫徹思想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式的批評放在首位。

此外，經驗又告訴我們：不但在選擇劇本及影片拍成後的試演中，運用原則性批評是一個決定性關鍵，影片初映及攝製中，更要着重聽取或發現觀眾的正確意見，特別是要聽取工農兵羣衆的意見，——這是影評專家們必須進行的頭等重要工作。

已經發表了的部分材料證明：在『武訓傳』電影問世前後，工農兵羣衆中都有過明確的否定武訓的意見。早在一九四八年夏天，人民解放軍部隊中，就有個別同志曾研究過是否可用武訓材料來教育部隊（主要是鼓勵文化學習）。『但結果大家認爲不行。原因是，武訓不僅沒有革命思想，而且他的行動是直接替反動階級服務的。』（見『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文藝報』四卷二期）山西太原上映『武訓傳』時，電信局職工中有人『看一半就不想再看下去』，據這位讀者的切身經驗，認爲政治制度不變革，興辦與反動統治階級利益不相吻合的『義學』是不可能的。爲了解東北農民對武訓的看法，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東北日報』登載了一篇短文，短文作者說他把『武訓畫傳』給農民看時，農民對武訓的行爲就馬上評之爲『太下賤啦！』『沒骨頭！』『翻身農民一語就接觸到問題的本質。不能夠漠視的還有一位讀者對『大衆電影』提出過這樣的意見：他說當『武訓傳』被『你們介紹推薦得很起勁』的時候，這位讀者卻『也有很多意見，也曾經寫過一點零碎的意見供你們參考過（按——這是在『武訓傳』被批判前），我一向是認爲武訓這個人物是不值得搬上銀幕的，而貴刊沒有一期是加以批評過』（見『大衆電影』二十二期錢念愉來信）。這位讀者舉出不止一個例子，認爲在電影批評中存在着混亂思想。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至少是因爲我們電影刊物編者的羣衆觀點薄弱，這種非常正確的，但在一個時期內可能祇顯出是少數的羣衆呼聲，竟被編者輕輕地給葬埋掉了，相反地，他們所滿滿登載的卻盡是專門家和羣衆